

# 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探赜

方 雷 谢科伦

**摘要:** 革命与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重要主题。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以革命的方式扫清了现代化的障碍,并持续以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党的自我革命具有不同于传统革命和西方近现代革命的现代性要义:在主体层面,自我革命塑造了党的现代性主体力量;在理念层面,自我革命阐释了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在治理层面,自我革命创造了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自我革命的现代性有效赋能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现代性主体力量整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利益,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效能。新时代新征程上,党要继续坚持自我革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革命; 现代化; 自我革命; 现代性; 中国式现代化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0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sup>①</sup>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党的自我革命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只有以自我革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立场与方向,更好地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现代化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也是社会不断具备现代性要素的结果。以革命党为本色的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革命来改造自身、国家与社会。中国共产党叙事话语中的革命,不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还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亨廷顿曾指出:“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sup>②</sup>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sup>③</sup>之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使中国驶入“历史的快车道”,成功地使中国摆脱了民族耻辱,开启了现代化之途。这被迈克尔·曼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它提供了替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最成功的方案”<sup>④</sup>。同时,社会革命还是勇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伟大社会实践。这表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逻辑:‘党的领导’的阐释路径研究”(24VRC082)。

**作者简介:** 方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 266237; fanglei@sdu.edu.cn);  
谢科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齐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济南 250353; 347011950@qq.com)。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3—44页。

②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④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下),郭台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5页。

明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二者相互促进,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sup>①</sup>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党的自我革命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社会革命提供持久动力。自我革命也是根除积弊沉疴、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要素铢积寸累的重要方法。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仅有利于保持党的革命属性的“连续统一”,形成革命与现代化的互构图景,而且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要求蕴含着重要的时间意义,凸显着关键的时间效能,与现代性这项“未完成的设计”<sup>②</sup>高度契合。自我革命是党进行现代性调适与改造的主要方式,在主体、理念、治理三方面内含着现代性要义,而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要义又有效赋能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产生了巨大功用。

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在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方面,有学者提出了“革命式现代化”的观点<sup>③</sup>,还有学者试图利用革命与现代化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政治学话语<sup>④</sup>。第二,在自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方面,有学者提出了自我革命—政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政党行动逻辑<sup>⑤</sup>;还有学者提出,党以坚持自我革命的理论自觉、根本动力、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sup>⑥</sup>。第三,在党的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要义方面,有学者提出,通过这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sup>⑦</sup>。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革命与现代化、自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要义等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解析,但仍存在不足。将研究视域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对自我革命蕴含着怎样的现代性要义,以及它如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较少。艾森斯塔特曾提出:“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sup>⑧</sup>虽然现代性的原初状态属于西方,但西方原初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无法对不同国家作出整齐划一的同质性裁剪,多元现代性是对西方单一现代性下“历史终结”之终结。现代性从出现之时起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定论。自我革命中的“自我”体现出行动主体的自我指涉关系,“革命”又体现出行动主体的主动性要求。自我革命蕴含的现代性要义,能够有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巨大功用。因此,建立自我革命、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联,详解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要义以及它如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境遇

革命与现代化都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和对未来的建构。在中国,党以革命的方式扫清了现代化的障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其中,党的自我革命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蕴含着重要的现代性要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实践四大方面入手,能够构建起党以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 (一)理论溯源: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观的必然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本国和落后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激发了人民强烈的革命反抗意识。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基于自身解放的需求,有意识、有策略地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与旧式政党完全不同的组织力量,成为具有坚强革命观念的无产阶级政党。无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1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③ 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页。

④ 郭台辉:《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探索》2020年第3期。

⑤ 孙会岩:《坚持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逻辑》,《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⑥ 张三元:《坚持自我革命: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⑦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探索》,《全球化》2018年第2期。

⑧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8页。

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①</sup>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②</sup>由是观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观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共产党人要把革命的要素植根于内心深处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明确了革命的目标是不断改变落后状况,推进国家与社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这内含着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现代化要义。在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观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首要步骤是通过暴力形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无产阶级政党要“接榫”革命者身份,找寻新的“革命之锚”,促成革命成就的跃迁,就必须牢记“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sup>③</sup>。列宁也曾强调:“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sup>④</sup>从无产阶级政党的起源和革命观可以看到,自我革命已成为后发国家政党领导本国人民摆脱殖民者的压迫、推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作为典型后发国家的中国要推进现代化事业,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因此,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观,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初心使命“不变质、不褪色”,进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之举,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溯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 (二)历史镜鉴:自我革命缺位是苏联现代化失败的深层原因

在政党政治时代,任何一个政党都面临着内部治理的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对于执政的大党来说,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克服执政惰性,兹事体大。这是维系政党生命力的根本、决定能否长期执政的核心。历史是“生活之师”,它并非贫乏空洞的时间流逝。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最有效的进步方式之一。回溯苏联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拉开了革命再造苏联现代化的历史序幕,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要求政党要不断自我革命,成为真正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sup>⑤</sup>,同时他也发出警告,即政党如若放弃自我革命,丧失先进性,就会出现“整个机器就要散架”<sup>⑥</sup>的危险。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现代化事业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在长期执政中惰性尽显,不能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革命理想变质,革命信念变弱,革命斗志衰微,忘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与使命,致使自我革命在苏共身上出现严重缺位。由于自我革命的缺位,苏共的治理逐渐失效,内部滋生的蜕化变质和腐败特权等现象严重侵蚀了其执政根基。苏共成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彻底放弃了自我革命,共产主义旗帜也被丢弃,苏共在封闭中走向衰亡。当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悄然落下,一度辉煌的苏联现代化黯然退场。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自我革命缺位是苏联现代化失败的深层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sup>⑦</sup>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历史镜鉴意识,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绝不能在党的建设中出现自我革命的缺位与空白。只有这样,才能以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2页。

⑥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71页。



### (三)现实图景:资产阶级政党阶级本性的桎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的根源

任何政党都不是处于真空之中,政党之间的比较无时无刻不在。其中,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是进行政党比较的两个重要维度。如果说在与苏共进行纵向比较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收获时刻保持清醒的历史教训,那么在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横向比较中,中国共产党可获得避开现代化发展陷阱的现实启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其阶级本性的桎梏,无法做到“革资本的命”,更无法做到“革自己的命”,致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为回应外界环境变化,均试图通过“自我调适”等方式来完成政党转型。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存在。维护资本利益的阶级本性注定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自我调适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的根源所在。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来看,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奉政治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为主臬,与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深度绑定,迎合不同群体。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sup>①</sup>,是资本内部矛盾的投射。党争撕裂了社会,资产阶级政党整合社会的能力式微,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充斥着碎片化的利益。从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式来看,资产阶级政党唯资本“马首是瞻”,心甘情愿做资本的“尾巴”,是资本在政治上的代理工具。它们单纯以资本的方式推进现代化,从而导致巨大的贫富分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沦为精英的天堂、底层的地狱。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来看,由于赢得选举的功利性追求是资产阶级政党“计算性的利己主义的产物”<sup>②</sup>,政党捐客只注重眼前选举利益,罔顾国家长远需求,现代化目标缺乏规划,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政党的调适无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勇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性,有效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坚决的自我革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党与人民形成了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的合力”。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看,党通过自我革命谋长远之策、蓄未来之势,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因此,党以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 (四)实践定向:在党的革命与现代化的互构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性

现代化率先在西方拉开帷幕。西方国家以革命的方式开启了现代化历程,建构了一整套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型特征,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并非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在遭受外来冲击的形势下被动回应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动从容架势与近代中国现代性的被动慌乱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被动姿态造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冲突,在效仿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后者显得尤为紧要,并成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起点。换言之,中国要追赶西方现代化但又不能依葫芦画瓢完全复制对方。面对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所作出的反应必然不同。在中国,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必须首先确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③</sup>党在以革命推进现代化事业过程中首先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马克思主义也为党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

②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

观念变革和制度建构。”<sup>①</sup>党的革命纲领的彻底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狭隘,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锚定人的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改写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同时,在党的革命与现代化的互构实践中,要沿着社会主义现代性方向进一步前进,仅有社会革命是远远不够的。社会革命带来的现代性成果只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部分体现,而非全部要素。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党的革命内涵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党的革命谱系不断得到新的完善。党要不断以革命的新形式完成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完整拼图”,因此在守正的同时还要创新。在党的诸多革命实践中,自我革命最为特殊,因为它贯穿于党从革命到执政的全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更是世界政党治理范式中的创新之举。自我革命意味着党成功地一身二任——兼负革命党与执政党双重角色。自我革命也因其独特的革命内涵和现代性要义,能够继续让党以革命的形式书写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 三、自我革命的三重现代性要义

现代性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西方线性、一元的现代化模式所呈现出的现代性不足以解释世界的多样图景。现代性从萌芽时起,就一直是变化不居的。在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sup>②</sup>。自我革命接续党的革命传统,能够将党从传统的革命叙事中解放出来,打破被西方革命所遮蔽的革命本质内涵,在主体、理念和治理三方面体现出了重要的现代性要义。

#### (一)自我革命塑造了党的现代性主体力量

革命的现代性主体力量既包括坚强的个体,还要具备强大的组织。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陷入了一场全面危机,面临着整体性的秩序崩溃。国家与社会的“双弱”格局呼唤现代性主体力量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受命于危难之间,然而,如何在革命的战火硝烟中永葆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列宁-葛兰西之问”。党的自我革命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自我革命通过对党员的塑造,对问题和危机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自我革命让党员在斗争中表现出一种强大的革命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在自我革命的塑造下,优秀的共产党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和最坚决的战斗者,他们以革命的方式改造国家与社会,同时不断改造和提升自己,淬炼出最坚强的个体力量。党员的先进性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指向和现代性意蕴。同时,党还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使党员个体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以日常示范的方式感染、引领群众并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党的革命本色“褪去”。列宁曾说:“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sup>③</sup>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继续保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锤炼革命意志。经自我革命塑造的党员个体力量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他们不断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方位进步,专注于“人的解放”这一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无论是在革命还是执政中,党员个体力量均指向现代化的方向,持续推进人的现代化,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现代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具备了现代性的个体力量,成为更符合现代性标准的政党。

① 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赵剑英、庞元正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69页。

②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另一方面,组织是现代社会革命的基本单位。列宁曾说:“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sup>①</sup>因此,作为现代政治最重要主体力量的政党,不应仅仅是一个名字、一种精神意象,还应在现实中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实现政党自身和外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以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展现现代性特质。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提升组织能力、塑造组织力量,面临着其他政党所没有的“大党独有难题”。“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现有基层组织525.0万个。”<sup>②</sup>面对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既遵循一般政党的组织逻辑,更具备自身独有的组织特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组织理论的中国共产党直面难题,依靠自我革命,在内外两方面提升了组织能力,塑造了党的组织力量。其一,从内部来看,党并未盲目扩大政党规模,而是以现代性标准规范入党的程序,严格入党的标准。党在“严把大门”的同时,还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提升组织质量。面对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腐败问题,党以绝不姑息的高压态势,着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断发现和改正自身错误,严惩腐化堕落分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祛除有害因子,清除不利因素。通过自我革命,党的组织体系更为严密,党员队伍更加纯洁,党的组织能力得以不断提升。其二,从外部来看,组织社会学认为,政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逻辑。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驾驭资本的问题,党以自我革命的自律精神和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利用资本的积极面,摒弃资本的消极面,合理引导资本,有效控制资本的野性,杜绝资本的野蛮生长,同时将资本的腐蚀拒之门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但将组织能力的“根茎”在广度和深度上蔓延,还防止了资本的俘获,成功驾驭了资本。“党的力量来自组织”<sup>③</sup>。高度组织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通过自我革命,党在内外两方面都提升了组织能力,有力地巩固和充实了组织力量的基础。高度组织性切实符合了现代性的标准与要求,充分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提升组织能力、塑造组织力量的现代性内容。

## (二)自我革命阐释了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

将自我革命纳入哲学层面进行现代性审思,既是现代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关涉从哲学高度深刻把握主体的价值理念。

在本体论方面,自我革命深入分析本质问题,深刻阐释了党的本体论哲学理念。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革命的本义为新旧事物的交替和彻底的变革。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革命,革命理念一直活跃于党的话语体系之中。以革命的方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是党矢志不渝的信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问题,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决议中最具分量的“本质之问”。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把“自我”一词放置于革命之前,自我革命就构成了对百年大党“本质之问”的有力回答,与本体论意义上“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遥相呼应。从哲学意义上讲,自我革命的本质是“主体在主动意义上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sup>④</sup>。自我革命把自我主体作为革命客体,深度剖析本质,意味着对本质进行否定之否定并扬弃。所谓“扬”,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主体通过自我反思产生新的肯定性的结果,并使之成为更高层次上对原来的肯定。表现在党身上,即自我革命要保证时空场域的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继续发扬。在时间维度上要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延伸时间长度,打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轴。既关照过去和现在,又面向未来,从时间“繁芜”中抽取出来并恒定其中。在空间维度上要拓展自我革命的范畴,重构组织与党员的关系。所谓“弃”,即肯定中也包含着否定。主体通过自我否定,打破原有桎梏,不断超越自我。表现在党身上,即通过自我革命,党居安思危,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

① 《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5年7月1日,第4版。

③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④ 《曲青山党史论集》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1页。



难,排除影响党发展的不利因素,永葆党长期执政的生机与活力。自我革命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本质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扬弃也是对本体论哲学理念的重释,超越了西方唯心主义意识决定论的理念,形成了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之外的另一种存在。

自我革命还立足于客观实践,深刻阐释了党的认识论哲学理念。自我革命立足于客观实践对党的认识论哲学理念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不是像照镜子一样的直观机械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较之于受动性,能动性更能体现自我革命的本质特点。自我革命是一场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旧唯物主义虽然走出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王国,但进入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人、没有感性实践活动基础的抽象王国。自我革命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主动发现问题,以历史主动精神革自己的命,更加彻底地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第二,自我革命对党的认识论哲学理念的阐释,还体现在它确立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认识的基本路径。自我革命不单看到“就其自身显示自身”<sup>①</sup>的表面现象,还力图回答“何为其所是”的根源性问题。如针对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的腐败现象,党从本质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本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建设,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三,自我革命对党的认识论哲学理念的阐释还体现在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检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成果,是自我革命的客观要求。实践标准能够检验自我革命的实际效能,而经过实践检验的自我革命效能赋予党正向反馈,调动了党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认识,从而深刻阐释了党的认识论哲学理念。

### (三)自我革命创造了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

相较于统治,治理是更具现代性意蕴的表达方式。自我革命包含着政党治理的现代性意蕴,创造了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力量,现代政治需要政党的领导。一个强大的政党离不开现代性治理体系的塑造。因此,政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成为现代政治发展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狭义上的政党治理是指党内范围的“对于党内精英、政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用以提升政治生命和政治活力,进而实现有效执政的各项活动”<sup>②</sup>。自我革命属于狭义上的政党治理,政党治理是自我革命的首要面向。自我革命所创造的政党治理体系,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表现出现代性意蕴。

在工具理性方面,自我革命所创造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必须依靠严格的党内法规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必依法度,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工具,是党组织理性化的结果。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设置了规范且严格的要求,在适用性上也严于国法。铁一般的党内法规锻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规范了政党权力的有效运行,将党塑造为高度理性自律的组织。民主集中制也是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要坚持的重要原则和工具。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通过上述工具,在组织程序上,党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流程,能够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行为。在组织结构上,党并不是只有上下沟通而没有水平沟通的“垂直集中制”,而是呈现出一种“‘主干—经络—细胞’三位一体的结构:包括各级党委体系,基层党组织(基层委员会、总支部、支部)和党组,以及作为组织微观细胞的党员”<sup>③</sup>。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理性化组织结构,能够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因此,自我革命创造的理性化、规范化的政党治理体系在工具理性方面展现了现代性意蕴。

工具理性侧重于通过客观要求让党员和党组织依规履行职责,党内法规面前一律平等。但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不能“去价值化”,它还具备主观层面的自觉遵守的内容,这是价值理性提升党员主动性、赋予政党治理情感要素的体现。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4页。

② 陈家喜、黄惠丹:《论政党治理视域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初心与使命,具有向善的本能与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准地道出了政党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深深烙印于党的“肌体”之上,要求党在治理中将善作为价值基准点,用价值理性之善提升政党治理效果,规范政党治理体系。价值理性之善成为政党治理的伦理标签与道德底色,从而防止道德伦理面对工具理性的沉默与疏离,对于纠正工具理性过当有很大作用。这是政党治理体系在价值理性上展现现代性的有力佐证。“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理性化问题。”<sup>①</sup>现代性的关键在于对理性力量的推崇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然而,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极易造成现代性危机。党自身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保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于理性天平的两端,并实现平衡。

#### 四、自我革命的现代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现代性要素的过程。自我革命在主体、理念和治理三方面体现出重要的现代性要义,不但使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而且还有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 (一)党的现代性主体力量整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利益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力量多元化的过程。现代化由于在一定时间段内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极易产生社会裂痕。整合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各异质部分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弥合裂痕,消解离心趋向,共建一个有机的社会共同体。整合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社会利益的整合。社会利益整合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冲击了传统社会,使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另一方面使人们从固有束缚中解放出来,利益诉求变得多样。因此,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是利益的重新整合过程。在整合社会利益的过程中,政党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sup>②</sup>。政党是引发社会冲突还是完成社会整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在西方现代化中,源于“部分”的政党往往是“社会裂痕结构在政治层面的反映”<sup>③</sup>。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当社会整合的力量”<sup>④</sup>是政党现代性的若干内容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一个现代性主体力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保障现代化进程的平稳运行。自我革命塑造了一个既拥有坚强的个体力量,又具备强大的组织力量的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党的现代性主体力量从党员个体和组织两个方面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整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利益。

从个体力量方面来看,党员是群众的代表,将群众利益作为整合社会的起点,并通过表达群众利益,将其所代表的不同阶层和范围的群众组织起来。一方面,党员要下沉基层社会,深入群众,从而有效地建立起了执政党与社会的连接点。下沉基层的党员利用党建实践活动主动融入群众生活,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把情感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收集群众的意见要求。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党员个体力量亦源于人民。党员下沉即个体力量根部向下深扎于“社会土壤”,不但能够避免科层化、垂直化的组织结构疏远群众的问题,而且能使个体力量源源不断地汲取社会土壤中的“养分”,从根本上夯实了党员个体力量的基础。另一方面,下沉后党员还要将群众利益向上表达出来,保证群众利益得以实现。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⑤</sup>政治社会学也认为,利益冲突是社会秩序紊乱的主要原因。利益表达是政党的功能之一。中国共产党通过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党员来表达群众利益,不但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为政治系统争取了广泛支持,巩

① 陈学明、张双丽、马拥军等:《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7页。

②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③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4, p. vii.

④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固了党的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而且超越了西方政党的部分利益表达功能,具备了整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

从组织力量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深嵌于社会之中,建构起一张巨大的同心圆网络结构,覆盖了整个社会,有效整合了社会组织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具有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组织体系,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是组织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向上集中于党中央,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服从于党中央,它们是中央权力在地方和基层的延伸,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横向上,各级党委设立一定的机构如纪检、组织、宣传等部门,履行党组织的事务性功能。党内部整合的规范性增强了组织力量,为外部社会组织利益整合奠定了基础 and 前提。另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利益的碎片化,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对社会利益整合提出了新的考验。党积极地在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中建立支部,将组织“触手”延伸至社会组织之中,扩大了党组织的社会覆盖面,织密织实社会的党建网络。在方式上,一方面,党改变了先前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避免了党社一体,在尊重社会组织利益的基础上培育其自主性,让社会的回归社会,使社会组织真正拥有服务和协调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建立的党组织以区域化党建格局发挥组织联动效应,促进了区域内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与互动,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组织利益,增强了政治凝聚力。总之,现代性的个体力量和组织力量决定了党是“将各种利益诉求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公共政策的最可行的平台”<sup>①</sup>,“通过同心圆的、外推型的组织网络体系,创造党的组织进入社会、联系社会,进而有效整合社会的新型整合体系”<sup>②</sup>。

## (二)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

现代化在不断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需要价值原则的引导。在某些西方学者眼里,现代化在西方的先行经验预设了西方价值原则的意义。如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理性化过程,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关键<sup>③</sup>。如果以此价值判断为基准,容易得出由于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导,东方国家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然而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打破了“韦伯命题”的局限性。自我革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深刻阐释了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是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哲学变革,实现了对以往旧哲学、旧观念的超越,将韦伯说的“唯物主义矗立在了观念与文化——‘伦理’和‘精神’——的基础之上”<sup>④</sup>翻转过来,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原则。

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由于自我革命是主体主动地、积极地自我扬弃,也是主体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因此,自我革命在本体论上对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的深刻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辩证的否定”价值原则。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要以“辩证的否定”妥善地处理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在价值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以资本为核心,“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sup>⑤</sup>。中国式现代化要认识到资本的文明面,正视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助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

① 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等:《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② 林尚立:《轴心与外围: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与中国社会整合》,《复旦政治学评论》,2008年,第340—358页。

③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48页。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0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避免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追随,要以“民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在利用资本主义文明面的同时还要驯服资本、驾驭资本,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对西方现代化的成果有选择地扬弃,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本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因此,“辩证的否定”理念就在党与国家高度关联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价值能量,成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原则。

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看,由于自我革命是一场立足于客观实践的行动,因此自我革命在认识论上对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的深刻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决定认识的观点,先从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又上升到理性认识,并把理性认识应用到实践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1年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探索中遵循着宏观层面确立战略规划蓝图、中观层面以项目制和干部责任制强力落实、微观层面通过政策实验灵活调适的“以规划促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立足于中国实践、提高对现代化的认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只能造桌子椅子、茶壶茶碗,不能造汽车、飞机、坦克的实际情况出发,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对现代化认识不足,中国式现代化一度走过弯路,遭遇挫折。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规律,从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中萃取认识论精华,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践行知行合一、知行共进的实践思维。随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丰富,现代化事业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原则基础上稳步向前。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一万美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等等。新时代我们要继续立足实践,坚持党的现代性哲学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认识论价值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认识和实践都是永无止境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在永续良性循环中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 (三)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效能

现代治理概念提出后,在发展中破解了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所导致的工具与价值的悖论,“治理理论关于多中心、多层次、多种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大量论述,都表现出两个并存的取向……实现效率和维护价值的取向往往是同一的”<sup>①</sup>。然而当今世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缺少成熟稳定的治理体系,出现了政党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为了政党短期利益而相互倾轧、纷争的治理乱象,导致政治撕裂严重,反映在治理效能上便是治理效率与治理价值的严重缺失。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治党与治国的高度耦合逻辑又决定了中国之治效能的提升得益于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创造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体现出现代性意蕴。它是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政治生活中的有效应用。因此,自我革命创造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在工具理性方面保证治理的效率,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层治理效能,又能在价值理性方面保证治理的价值,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治理效能。

从工具理性方面来看,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保证了治理的效率,有效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层治理效能。科层治理是依靠以科层组织结构为主干的行政官僚系统所进行的专业化治理。它要求治理必须如同分工精细且专业的现代企业一般,按照工具理性的取向进行运作。科层治理往往剔除了情感与价值色彩,设置了不同的管理层级,一方面,这使得治理变得程序化,行政官僚系统犹如一台配置精密的自动化办公机器。把需求信息输入到这台机器的系统之中,机器系统就会流程化运作输出一个可预测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层治理稳定性和效率性的体现。另一方面,“金字塔”状的科层组织结构会因为较多的管理层级,极大地影响需求信息从输入到反馈结果输出的速度,损耗效率,使得科层组织权力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层治理要不断创新治理理

<sup>①</sup> 王诗宗:《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念,提升治理能力,力避科层治理中易出现的拖而不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自我革命创造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规范了党建活动。中国共产党将党建融入治理,以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治理的核心是政治引领。党不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增强党建引领的政治属性,以政治引领汇聚强大的政治势能。这种政治势能释放出巨大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能量。它能够冲破科层组织壁垒,绕过科层运作流程,将垂直的科层组织层级“扁平化”,有效解决了国家公共政策落实中的多层级问题,将政治系统精准对接特定群体或个体的需求,减少了行政效率损耗,在很大程度上“规避科层制所带来的‘钝感’”<sup>①</sup>,因而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层治理效能。

从价值理性方面来看,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保证了治理的价值,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治理效能。“现代意味着理性的和‘理性化的’”<sup>②</sup>,在现代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曾一度高歌猛进,道德情感和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价值判断变得不分善恶、没有感情。这种去人情味的治理让整个社会笼罩在编织精密的“机械铁笼”之中,使人感觉窒息与压抑。治理终究是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而非机器主宰,人是情感的动物,人民也不是抽象的符号。中国有着悠久的情治传统。情感工作历来也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成功的优势之一。将情感带回治理是现代化社会实现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必要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治理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让人的现代化增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由于中国特色的党政复合结构,党的组织内嵌于科层组织之中,科层官员普遍拥有党员身份,因此自我革命所创造的党的现代性治理体系动员了具有价值理性之善的“党性人”广泛参与其中,保证了治理的价值,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党性人”不是机械执行的“螺丝钉”,而是将情感融入日常工作、通过情感机制解决治理问题、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先进分子。“党性人”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情感能量注入治理过程,激发了社会公众的情感,增强了党与人民的情感共鸣,塑造了人人参与、人人争先的治理氛围,这不但是对行政化科层治理的有益补充,还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治理更具力量。

## 五、结语

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漫长转型过程,而现代性是“时间的历史”<sup>③</sup>,即时间在历史中建构的现代社会之本质特性。在漫长的时间中,现代性曾一度被理解为“地球和人类的完全欧洲化”<sup>④</sup>,但历史证明了,建构现代性的路径并非唯一,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止一条。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与霸道,暴露了其最残酷无情冷血的败坏面。广大后发国家无法将其作为参照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们初期以模仿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方向,从物质技术上的移植,到政治制度上的嫁接,再到思想文化上的碰撞,这是现代性自觉意识的艰难探索,也是逐步摆脱模仿,化他者为本己,使现代性获取中国身份标识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以革命的手段很好地回应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冲击。革命成为中国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中国以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国家独立为逻辑起点来建构现代性,将现代性诉求浸染了更多的革命与救亡特性。党领导的革命出场后,革命理论和话语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其目标直指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现代化中建构了一种新现代性,并且将这种新现代性不断赋能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添砖加瓦、鸣锣开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领导的革命是建构现代性、赋能现代化的保障。在党的革命谱系中,自我革命作为革命内涵的现代表达和独特形

① 叶子鹏:《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治理研究》2024年第1期。

② 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6页。

③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1页。

④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19页。



式,“不是原有场域结构的简单重复,或原有场景意义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重新布展和意义重构”<sup>①</sup>。党以自我革命为依托,更好地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自我革命还内含着重要的现代性要义,它扩展了现代性在中国的表达空间,并将其蕴含的现代性要义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呈现出创新性样式和光明的前景,这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作出了表率、提供了参考,也是对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最大礼敬。

## The Probing of Modernity of Self-Reform Enabl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ang Lei<sup>1</sup> Xie Kelun<sup>1,2</sup>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P.R.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250353, P.R.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onstitute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symbol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at differentiates the CPC from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self-reform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PC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and vigor. It enables the CPC to always maintain its advancement and purity,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advanc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s self-reform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uld constantly incorporate more elements of modernity. The CPC's self-reform embodies a strong sense of modernity,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us bett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hina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s self-reform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econdly, through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self-reform, the paper examines how it has shaped the CPC's modernity subject power, interpreted the CPC's philosophy of modernity, and created the CPC's modernity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modernity of self-reform i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CPC's modernity subject power integrates the soci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PC's philosophy of modernity establishes the value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CPC's modernity governance system improves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summary, we believe that in the new journey, the CPC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self-reform to promot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human modernization.

**Keywords:**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Self-reform; Moderni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李春明]

<sup>①</sup> 任平:《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09页。